

## 给我儿子亚历山大

我的朋友萨沙：

我要把这本书献给你，因为我以前从未写过比这更好的，而且，也许今后也未必能写出比这更好的书来。还因为我喜欢这本书，这本书是我为之做出许多牺牲而非认识的勇气的那场斗争的一个纪念碑。最后，还因为我丝毫也不担心把这本书递交到你这少年人的手中，这本书有些地方文字十分放肆，表达了一个独立不羁的个人起而反抗陈腐、奴役和谎言的观念。起而反抗原本属于另一个时代，但却在我们中间毫无意义地苟延残喘、了此余生地妨碍一些人，而又恐吓另一些人的荒谬绝伦的偶像。

既然我了解真相，如我所知，我也就不愿意欺骗你，不妨让你也了解真相，但不是通过令人痛不欲生的种种错误，也非通过能致人死命的悲观绝望，而是依据简单的遗产继承权。

你的生命中将会面临另外一些问题，另外一些冲突……还将会有足够多的痛苦和劳作。你才 15 岁，可你遭受过可怕的打击。

你不要在这本书中寻找答案——这本书里没有答案，一般来说，

在一个当代人那里是根本不会有答案的。凡系定局，便系终局，而未来的变革才刚刚开始。

我们不是在建设，而是在破坏，我们不是在发布新的启示，而是在根除旧的谎言。当代人乃是一个哀伤的伟大的桥梁建筑师，他只是在把桥架起来，让异样的、不可知的未来穿桥而来。你也许能看见它的模样……切勿停留在旧的岸边，宁愿与过去一同死去，也不愿在反动派的养老院里获得拯救。<sup>1</sup>

未来社会变革重建的宗教乃是我遗传给你的那样一种宗教，这种宗教除了自身的意识和良心外，没有天堂，也没有奖惩……在你有生之年去给我们国内人宣扬这种宗教吧，那里的人一度非常欣赏我的语言，也许他们还能想起我来。

为了人类理性、个人的自由和兄弟般的博爱，为走上这条道路的你祝福！

你的父亲

1855年1月1日于特维克涅姆

---

<sup>1</sup> 这是给儿子的献词的最后一行，是编辑按照作者生前版《彼岸书》原样恢复的。包括手稿在内的此句的另外变异形式包含下列名言：“宁愿与革命同死，也不愿在反动派的养老院里等死”，该手稿的影印稿发表于1912年《言论》杂志第83期。——原注

## 引 语

《彼岸书》是我在西方出的第一本书，该书汇集了我于 1848 年到 1849 年间用俄语写的文章。我曾亲自给年轻的文学家费·卡帕用德语口述过这些文章。

如今该书中许多内容已然不再新鲜了。<sup>1</sup> 五年可怕的岁月毕竟也能教会我们这些最顽固不化、最无愧悔之心的罪人一些什么吧。1850 年初这本书在德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除了像尤里乌斯、福祿培尔、雅各布、法利梅列伊耶尔这些人多为客气的反响外，无论赞扬还是詈骂都非常激烈，一些才华横溢、正直诚恳的人，竟然怒火填膺地抨击这本书。

人们谴责我宣扬绝望，谴责我不懂人民，谴责我以一种爱的苦闷反对革命，谴责我不尊重民主，不尊重民众和欧洲……

---

1 我补充了三篇发表在杂志上和为未获德国书报审查机构通过的第 2 版写的文章。他们是：《1849 年的尾声》《把所有东西带在身上》和《多诺佐·科尔考斯》。我用这三篇文章替换了一篇为外国人写的有关俄国的小文。

12月2日，有人以比我更响亮的声音回答了他们。<sup>1</sup>

1852年，我在伦敦见到了我最机智的对手佐尔格，他正忙着尽快去美国，因为他觉得在欧洲已经无事可干了。“看起来，”我对他说，“形势已经告诉您我并非完全一无是处？”佐尔格好心地笑着回答我说：“我不需要大费周章就知道，我那时写的都是胡说八道。”

尽管有人这样善意地认可，舆论得出的总的结论和留给人们的总体印象，仍然是对我不利的。这是不是说，暴躁易怒，意味着威胁的逼近；面对未来的恐惧，意味着掩饰自己弱点的愿望，意味着天真任性、头脑僵化的老年呢？

……俄罗斯人的命运好奇特——他们看得比邻国人更远，也更阴郁，并且勇于说出自己的意见——俄罗斯人都是些“哑巴”——米什列如是说。<sup>2 3</sup>

以下文字就是早在我之前我们的一位本国同胞写下的：

“谁比我们俄国人更能颂扬18世纪的优点、哲学之光、习俗的改进，社会精神的无远弗届的普及，各民族间密切而又友好的关系，统治方式的温和？……尽管人类的地平线上仍有几朵乌云，但明亮的希望之光已经照亮了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曾经以为这个

---

1 1851年12月2日，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实施了全国政变，取缔了立宪会议，一劳永逸地葬送了1848年二月革命的成果。——原注

2 米什列在1851年发表于《L'Avenir du Peuple》的《关于科斯丘什科的传说》中，对俄罗斯人的性格进行了描述，嗣后又在《民主传说》一书中做过评述。在考察米什列对俄罗斯人的态度的同时，赫尔岑又在《俄罗斯人民与社会主义——给让·米什列的一封信》一文中，与其论战。——原注

3 科斯丘什科（1746—1817），1794年波兰起义领袖。曾参加1775—1783年的北美独立战争，在战斗中负伤，被沙皇军队俘虏。颁布了1794年波拉涅茨令。1796年从彼得保罗要塞中被释放出来。死于瑞士，遗骨被送往克拉科夫。——译注

世纪的终结就是人类最大灾难的终结，以为终结之后便会继之以理论与实践，思辨与行动的结合……这一给人以安慰的体制如今安在？它连根毁灭了，18世纪正在走向结束，而那个不幸的善人跨出两步为自己量出坟墓，以便带着自己那受骗上当、被撕碎的心躺在里面，永远阖上双眼。”

谁还敢于思考、期待和预见呢？我们曾经爱戴的那些人究竟在哪儿？科学与智慧的果实在哪儿？启蒙时代啊，我没能认出你；你浑身浸着血与火，你充满杀戮和破坏，我没能认出你。

厌新症患者得意扬扬。他们说：“这就是你们启蒙的果实，就是你们科学的果实，而且哲学也正在死亡！”——可怜兮兮，失去祖邦，可怜兮兮，失去血缘，失去父亲、儿子和朋友的人在重复：是啊，是正在死亡！

流血事件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我相信劈砍利剑的那只手总会疲倦的；地心深处的硫黄和硝酸钾总会耗尽的；雷霆会沉默，寂静迟早会到来，但这将会是怎样的寂静呢？——是不是一种僵死、寒冷而又阴暗的寂静呢……

在我看来科学的堕落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甚至近在咫尺。而一旦科学堕落，一旦这座恢宏壮丽的大厦倒塌，慈善的灯火熄灭——世界将会怎样？我万分恐惧，我心在颤抖，假使我们能从灰烬中抢救出几颗火种，假使有几个人找到了火种，并用它们照亮了自己那间宁静而又孤处的茅屋——可对世界又该怎么办？

我掩住自己的脸！

难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种族已经达到启蒙所能具有的最

高程度了？接下来就该重新堕入野蛮，再重新一步一步地走出野蛮，就像西绪福斯推的那块石头，刚被推到山顶，石头便由于自己的重量又滚了下去，于是这位永恒的劳工就不得不又一次把它推向山顶？——这形象好不令人悲伤！

如今我觉得似乎就连编年史也在证实这种观点的或然性。我们未必知道古代亚洲那些民族和公国的名称，但根据某些历史片段可以断定这些民族不是野蛮人……一个个公国覆灭了，一个个民族消失了，从尘埃中诞生了新的种族，他们诞生于黑暗中，曙色熹微中，诞生于襁褓中，他们经过学习终于成名。也许，早在埃及的光辉闪耀之前，许多地域没入永恒，人的头脑里有过几个白天，黑夜也曾数次使人灵魂晦暗。

埃及的启蒙运动是和希腊启蒙运动结合在一起的，罗马人就是在这一伟大学派中学习的。

继这一辉煌时代而来的，究竟是什么呢？是长达数百年之久的野蛮。

浓密的黑暗是渐渐变得稀薄，渐渐变得清亮起来的。终于，太阳出来了，善良而又有仁爱之心的人们见识了人类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成就，看见完美的目标已然近在咫尺，于是，他们兴高采烈地欢呼：到岸了！可是，天空中突然风云变色，人类的命运被淹没在酝酿风云的乌云中！啊，后代呀！怎样的宿命在等待着你？

有时候令人难以忍受的忧郁挤压着我的心口，有时候我会跪倒在地，张开两臂向那位不可见者祈祷……没有回答！——我的脑袋低垂在胸口。

在同一个圆中的永恒运动，永远的周而复始，永远的昼夜交替，昼夜轮回，欢乐之水只有一滴，悲伤的泪水却汇成汪洋大海。我的朋友！我，你，我们究竟该怎么活下去呢？我们的祖先又是靠什么活的呢？我们的后代又将何以为生呢？

我的精神萎靡不振，充满忧伤！<sup>1</sup>

这些充满痛苦和愤懑、眼泪和忧伤的文字，写于 90 年代末。——尼·米·卡拉姆津。

---

1 赫尔岑是在引用卡拉姆津的《梅洛多尔格费拉列特的信》中的话，但有重要删节。——原注

# 别 了！

(1849年3月1日于巴黎)

(俄文稿的引言只有几句话，是对在俄罗斯的朋友们说的。我认为没必要在德文版中重复那些话——以下文字即是：)

我们的离别还将持续很久——兴许会是永远。眼下我不想回去，而以后有没有机会，我就不得而知了。你们等过我，现在也还在等，这就得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我们的缺席和我的行为有欠于什么人一个交代的话，那么，这当然指的就是你们了，我的朋友们。

一种无法遏制的厌恶感和强大的内心似乎在预言什么的声音，使发生的一切变得穷凶极恶，杯弓蛇影。它会以双倍的残忍扑灭任何理性运动，粗暴地把六千万人与谋求解放的全体人类剥离开来，它用黑黑的铁掌遮挡了正在烘烤波兰人鲜血的、本就透漏得十分吝啬的最后一线光明。<sup>1</sup> 不不，我的朋友们，我不能跨入这个国家的

---

<sup>1</sup> 看样子这句话是对匈牙利 1849 年革命的一个暗示，这次革命乃是 1848 年欧洲革命激起的最后一个回声。这次革命是在帕斯凯维奇陆军元帅统帅下的沙俄军队的协助下被镇压的。1830—1831 年间的波兰起义，也是他指挥军队加以粉碎的。——原注

边界，不能跨入这个黑暗重重、野蛮任性、恣睢肆虐，人们在默默死去，死了都无声无息，嘴里塞着毛巾忍痛不敢出声的王国。我将等待下去，等到这个政权被徒劳无功的折腾和反抗行动搞得衰弱无力、疲惫不堪，不得不承认俄罗斯人身上也有值得尊重的优点为止！

但请你们不要错误地理解我的意思，我在这里既未得到欢乐，也未得到消遣；既未得到休憩，甚至也未得到个人的安全。而且我也不知道现如今在整个欧洲，又有谁能找到欢乐与安宁——地动山摇时的安宁，殊死斗争时的欢乐。你们已经读出我书信里字里行间充满的忧郁，这里的生活非常艰难，往往是恶毒的仇恨混合着爱意，满腔的愤懑混合着眼泪，忧心忡忡的亢奋销蚀着整个肌体。从前那种充满欺骗和希望的时代已成过眼云烟。现如今我在这里什么都不相信，除了信任一小撮人、屈指可数的几缕思绪，还有就是相信运动是不可能停下来的。我所能看见的，是旧欧洲不可避免的覆灭，我对现存的一切都无所怜惜，无论是它的高端教育，还是它的体制机构。我不爱这个世上的任何东西，而只有它迫害的东西除外；我不尊重这个世上任何东西，而只有被它处死的东西除外——我将始终处于，始终处于双倍痛苦的状态，因自己和它的悲伤而痛苦，甚或死掉，在这个正在向大覆灭和大破坏全速滑行的世界中。

而我为什么要留下来呢？

我留下来是因为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斗争，虽然有血有泪，但一些社会问题正在这里得到解决。这里的人的痛苦是病态的、强烈的，但却是公开的；斗争是光天化日之下的，不会有任何人躲在暗处。战败者是很悲伤，但他们的失败不会先于战斗；在他们畅所欲言之

前不会被剥夺语言。暴力是疯狂，但抗议的声浪也很高；士兵常常会被拴上手脚带到大桅战船上服苦役，但他们却可以昂起头颅，自由说话。哪里有话语，哪里事业就不会死。我之所以留在这里，正是因为这里有公开的斗争，有话语，还有公开性。为了它们，我可以牺牲一切，牺牲你们，牺牲我的部分家产。或许，置身于精神健旺的“被驱逐迫害但却非被推翻”的少数人的行列中，我会牺牲生命。

为了这一话语，我甚至暂时或不如说是减弱了我与人民的血肉关系——我灵魂中光明与黑暗的一面都在人民中找到过许许多多的回应——人民的歌谣和语言就是我的歌谣和语言，我一直都和人民在一起，在人民的生活中，我予以深刻同情的，就只有无产者的哭泣，以及其友人们绝望的勇气。

痛下决心令我花费了很多代价。你们是了解我的，就请相信我好了。我压抑了内心的隐痛，我逐次体验了这场斗争，最后决定我不能像一个愤青，而应像一个对得失进行一番权衡的成年人那样。一连数月中我都在权衡轻重，犹豫彷徨，最后还是决定把一切奉为牺牲品：

为了人的尊严

牺牲自由的话语。

至于后果我就无暇顾及了，对后果，我力有不逮。后果更多的是掌握在随意任性者手中的，此人甚至忘掉自己曾经不光为我们的话语，而且也为我们迈出的每一步，用一把任意使性的圆规划定了范围。

在有可能不恭顺服从时违背自己的信念去恭顺服从，这是不道德的，令人痛苦的服从几乎是不可能。我曾见证过两次大变革<sup>1</sup>，我过得太像一个自由人了，不会被允许重新塑造自我；我经历过民众的骚乱，可我习惯于自由话语，我不能重做一回农奴，即使是为了能和你们同甘共苦也不能。如果为了共同的事业需要对自己有所节制的话，我会尽力的，然而此时此刻我们共同的事业究竟何在？你们的家里也没有可以让一个自由人立足的寸土呀。既如此你们还可以发出号召吗？——让我们起来斗争吧，至于默默无闻的苦难、徒劳无益的沉默和恭顺服从，无论什么借口也不能认同。你们要求我什么都可以，就只有口是心非除外。千万不要强迫我重新扮演忠君派，请尊重我的自由人身份。

个人自由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在其之上并且也只有在其基础之上，真正的人民意志才能够生长发育。一个人应当尊重自己的自由，并且也应在同等程度上尊重亲近之人和整个民族的自由。如果你们能确信这一点，你们就必定会同意，此时此刻留在这里乃是我的权利和我的义务，这是我们这里个人所能提出的唯一抗议，个人理应将这一牺牲品奉献给人类的尊严。如果你们把我的离开称之为逃跑，并且只是出于你们的爱心才把我原谅的话，这说明你们还未完全自由。

从浪漫的爱国主义和平民百姓的立场出发，会产生怎样的反驳，这我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我无法接受这种旧教徒派的观点，我

---

1 显然，赫尔岑这里是指 1848 年的意大利和法国革命，他曾是这两次事件的见证人。——原注

曾经和他们有过同样的体验，但我后来摆脱了这种体验，并且此时正在为反对这种观点而斗争。这些经过预热的罗马和基督教回忆的残余，是创造真正的自由概念——一种健康、清晰和成熟的概念——最大的障碍。在欧洲，幸好有人们的习俗和长期以来的发展，填补了荒谬理论和荒谬法律的空白。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种由两种文明滋养的土地上<sup>1</sup>。他们祖先所走过的，已经持续了两千五百年之久的道路不是徒劳的，让许多人性的东西在独立于外部体制和官方体制的情况下得以形成。

在欧洲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我们也能看到对个性的某种尊重，对独立性的某种认可——即对才华和天才让步的某种权力。尽管那时的德国政府行为非常卑鄙，斯宾诺莎却并未被强迫移民；莱辛未受过鞭刑或充军。这种不光对于物质，而且也对道德力量所表现的尊重，这种对于个性的由衷赞美是欧洲人生活中最伟大的人类原则之一。

欧洲人从不认为住在国外的人是罪犯，移居美洲的人是叛徒。

我国却非如此。我国人永远都是压抑的、心事重重的、不敢出头露面的。自由言论在我国永远都被当作是肆无忌惮、特立独行，被当作是造反和谋叛，人消融在国家中，消融在村社制里。彼得大帝改革是用欧洲式的办公制度取代了地主管理俄罗斯的陈腐方式，凡是能从瑞典和德国法律照搬的，凡是能从自治自由的荷兰向这个村社专制制度国家照搬的，都全盘照搬了过来。然而，那些给政权

---

1 第一种是古代文明即古希腊罗马文化，第二种是基督教文明，后者包括中世纪和近代。——原注

套上道德的马嚼子，从制度上对个人的权力，思维的权力和真理的权力加以认可的做法，却无法照搬也未被照搬过来。在我国，奴役制和教育同时增长，国家发展了，巩固了，而个人却未受益；与之相反，国家越是强大，个人就越是弱小。欧式的行政管理方式，法律制度，军事和世俗管理制度在我国却发展成一种畸形的、毫无出路的专制主义。

假使俄国不是如此广袤无边，假使异国的政权管理制度制定得不是如此含糊其词，执行起来不是如此混乱无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个对其自身的尊严稍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绝对无法在俄国生存。

政权当局的怙恶不悛由于遭受不到任何抵抗，所以常常到了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甚至到了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地步。你们也都知道在一定程度上系职业诗人的沙皇保罗的故事中，无法无天达到何种程度。如果剔除保罗身上主观任性、奇思异想的特点，你们会发现其实他根本就不独特。鼓舞他的那一原则，不但在他身上，而且也在每个省长、街区警察分局和每个地主身上，都表现为同一个原则，专制制度的醉酒状态支配了其著名的十四品文官系统的全部等级。在政权的所有活动中，在上层对下层的所有关系中，都以其极端的不负责任，表现出一种厚颜无耻、吹牛夸口。还表现为这样一种意识，即人什么都能忍受：三次招募，办理出国护照法<sup>1</sup>，工程学院的惩戒性鞭刑<sup>2</sup>。例如，18世纪是小俄罗斯率先实行农奴

---

1 显然，是指1844年3月15日尼古拉一世关于限制发放出国护照的指令。——原注

2 赫尔岑对这次事件的反应见其1843年11月4日日记。——原注

制的，最后，整个俄罗斯的人们都终于相信，人可以出售和多次出售，从未有任何人问过一句：所有这些买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甚至那些被出售的人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国的政权比土耳其和波斯都更加自信，更加自由。任何过去的东西都无法阻挡它，它对过去矢口否认，它与欧洲无任何关系，它不尊重人民，对全人类文化教育一无所知，却与此刻和当下相互抵牾。从前，政府面对邻国至少尚有几分愧色，至少还肯向邻国学习，如今却认为自己足以所有压迫者树立典范，如今是它在教导邻国。

我和你们都见识过皇位制令人感到可怕的发展。我们是在恐怖中，是在秘密警察黑色的羽翼及其魔爪下成长起来的，在绝望的压迫下我们变得奇形怪状、苟延残喘。但这就够了吗？是不是该采取行动了，是不是该松开双手，张嘴发言了呢？为了垂范于世，是不是该把人民的意识从沉睡中唤醒了呢？这些悄声细语，遥远的暗示和隐喻，呐喊和斩钉截铁的言论，都细小得人们未必听得见，难道这样能把人民唤醒吗？公开坦然的行动是必需的，12月14日之所以能给年轻的俄罗斯以如此巨大的震撼，是因为在伊萨基耶夫广场上有过公然的行动所致。而如今在俄国，不仅广场，就连书、讲台，都变成不可能的事了。剩下的就只有个人在寂静中默默无闻地劳作，和个人从远处发出的抗议了。

我留在这里不光因为我讨厌过境，讨厌戴木枷，还因为工作。抄起双手活着在哪儿都可以，而在这儿，我除了咱们的事外，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了。

谁在自己胸口怀揣一种思想达二十多年之久，谁曾为了这种思

想而受苦受难，以此为生，谁曾在各种监狱和流放地辗转迁徙，谁曾靠这种思想赢得了人生最美妙的时光、最甜蜜的交往际会，谁就永远也不会丢弃它，就不会让它处于一种依赖外在必要性和地理经纬度而存在的状态。相反，我在这里更有用，我在这里代表着你们未经审查的话语，你们的自由工具和器官，你们偶然的代言人。

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眼里看上去似乎都很新奇，而实际上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没有先例的。所有国家，所有改革肇创之初，都是如此。那时思想还很微弱，物质的统治甚嚣尘上，精明干练，对事业忠心耿耿的人才风流云散，他们的自由言论只能从遥远的彼岸发出，而这一远方本身也赋予其言论以力量和权力，因为人们透过言论看到了行动和牺牲。他们话语的威力随着距离而增加，正如一块从高塔上扔下的石头，其旋转力会增强那样。移居国外乃是濒临变革的首要征候。

对于国外的俄罗斯人来说，他们还有另外一桩事业，是该介绍欧洲认识俄罗斯的时候了。欧洲对我们缺乏了解，他们只了解俄国的政府、俄国的正面，其他则一无所知。此时正是欧洲人认识俄国的最好时机，此时傲慢自负于她而言似乎不合适，将自己庄严地裹在鄙视的无知的长袍里，似乎也不合时宜。高傲的鄙视对欧洲而言很不体面。自从她开始尝试一种市民专制制度和阿尔及尔哥萨克制度以来，自从她被人家从多瑙河到大西洋封闭而处于被包围状态以来，自从监狱和大桡战船里人满为患，充满了因信念而被放逐的人以来，俄罗斯……让她就近认识人民好了，让她在战斗中对其少年的力量给予评价，而人民在战斗中终究是胜者。不妨让我们对俄罗

斯讲述一番，这人民是如何强大，如何深藏不露好了；这样的人民竟然能悄无声息地建立起一个拥有六千万人口的国家，这里的人民发育得如此强壮如此迅猛，却并未丢弃其村社制的基础，而是通过发展国家的一些最初改革，首先对其加以延续。不妨让我们讲述一下这样的人民，这人民竟然能在蒙古汗国和德国达官显贵的统治之下，在执行军营纪律的下士的棍棒下，在鞑靼人可耻的皮鞭下，善于保持自己的本性。这人民善于在农奴制统治的压迫下，依然保持其伟大的特征，活跃的头脑和广阔气质的丰富天性，而且，作为对沙皇受教育令的一个回答——百年之后她以广泛的普希金现象做了回答。不妨让欧洲人了解一下自己的邻居，对这个邻居，他们只会单纯地怕，这不够，应当了解一下，他们怕的究竟是什么。

迄今为止，我们是处于不可饶恕的谦虚谨慎中，我们虽然认识到自己无权无势的艰难处境，但却忘记了我们人民的生活有着非常美好且充满希望的发展前景。我们终于等来了一个德国人向欧洲介绍俄国的机会。<sup>1</sup>——我们难道就不感到羞耻吗？

我能否来得及做一些事？我不知道，但我多么想呀！

好吧，别了，朋友们，永别了，把你们的手递给我，把你们的帮助交给我，这两者都是我所需要的。而今后会怎么样，谁知道呢？

---

1 赫尔岑指的是德国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哈克斯陶森，19世纪40年代，他受尼古拉一世的邀请到俄国旅行，随后出版了《俄国国内关系，人民生活尤其是乡村机关研究》。这本著作向西欧读者介绍了俄国，哈克斯陶森在此书中最关注的要点，是俄国的土地关系，尤其是村社制，他认为该制度是巩固农奴制的主要手段。赫尔岑对本著作进行了激烈批评，但与此同时也指出作者“真实地捕捉到了俄罗斯人民的生命原则。”——原注

会发生多少我们近来未曾见识过的事情呢！或许，看样子，离我们从前那样在莫斯科集合起来的那一天，已经并不遥远了。到那天，我们会豪放地举起我们的酒盅，喊一声：“为了俄罗斯和神圣的意志！”

我的心灵不愿意相信不会有这一天，一想到永别就会隐隐作痛。我好像连我常走的这条充满一个青年人之想象的街也视而不见，也看不见这些已经和我的记忆长在一起的房子，看不见我在意大利最南部曾经怀着一片爱心回忆过的俄罗斯的乡村和农民。这不可能！可是，如果是真的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会要我的孩子们替我举杯，在异国他乡，在临终的时刻，我会依然保持对俄国人民光辉未来的信仰，并从我自我放逐的遥远的地方，为其祝福！